

社会主义 图书馆学概论

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
第一期学员集体编写

文化学院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

文化学院

1961年·北京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
(内部发行)

文化学院出版

(北京西郊翠微路)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开本 787×1092公厘^{1/82} 印张 6^{1/2} 字数 117,000

1960年11月第1版 1961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001—6,500 定价 0.65元

出版說明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論”是1958年底我院“图书馆研究班”学员为了向1959年元旦献礼集体编写成的。初稿写成，就在“图书馆学通訊”（1959年第1期至第2期）上連續发表。接着又由北京图书馆印行了单行本。发表以后，它受到图书馆界的普遍关怀与重視；不少图书馆，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討論，并将討論意見寄給我們。对此，我們願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謝。

1959年夏季，我們邀請了参加编写該书的几位学员和北京市几个图书馆的负责同志，对各方面提来的意見，进行了討論，并根据图书馆工作的新情况，作了較大的修改补充。这次付印前，我們又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工作。虽是一本小书，已做到三議三改。

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經過广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努力，已經創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經驗。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总结这些經驗，从中找出規律，使图书馆学真正成为一門科学，可以說才仅仅是开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充分运用了理論联系实际与群众路綫的方法。理論联系实际，即在学习理論和文化工作方針政

策的基础上，交流經驗，总结工作，根据写书提綱进行了深入細致的討論；这样作，一方面，也就把实际工作中經常碰到而又难于解决的某些关键問題、某些矛盾，通过理論的概括和提高，从而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处理办法。群众路綫就是发动全体学员，人人动脑、动嘴、动手，把一点一滴的經驗都提供出来，然后加以提炼；而且在党委领导下实行了教师与学员結合，院內与院外結合，真正做到集思广益。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一日千里地向前飞跃，图书馆工作也不断地在发展；这本书的內容，可能有落后于形势的地方；缺点和錯誤也在所难免。我們殷切地希望图书馆界和广大讀者，能繼續对这本书提供宝贵意見，以便能有机会再加修訂，使它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提高。

文化学院

1960年10月

目 录

緒論.....	(1)
第一章 圖書館事业的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务	(16)
第一节 图书館事业的基本方針.....	(16)
第二节 图书館事业的基本任务.....	(30)
第二章 社会主义圖書館事业的建設	(47)
第一节 国家办館与群众办館相結合.....	(47)
第二节 贯彻群众路綫，开展业务工作.....	(56)
第三节 勤儉办館.....	(62)
第四节 培养一支又紅又專的干部队伍.....	(68)
第三章 讀者工作	(76)
第一节 讀者工作的重要意义.....	(76)
第二节 图书流通.....	(79)
第三节 宣傳图书、指导閱讀.....	(91)
第四节 书目、索引、解答諮詢	(102)
第五节 少年儿童讀者工作	(114)
第六节 怎样做好讀者工作	(116)
第四章 圖書工作	(121)
第一节 图书工作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121)
第二节 图书的采購、补充和登記.....	(122)
第三节 图书分类	(134)
第四节 編目工作	(148)

第五节	图书的組織和保护	(163)
第五章	业务輔導工作.....	(170)
第一节	輔導工作的任务	(170)
第二节	輔導工作的几个原則	(172)
第三节	輔導工作的几种主要方法	(177)
第六章	圖書館的分工和协作	(185)
第一节	分工协作的意义和作用	(185)
第二节	协作的范围和方法	(189)
第三节	协作当中存在的几个問題	(196)
結束語	(199)

緒論

(一)

毛主席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屬於一定的阶级，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綫的。”^① 它們不为剥削阶级服务，就为被剥削阶级服务，二者必居其一。图书馆事业也是如此。封建社会的图书馆（藏书楼），为封建統治阶级服务。资本主义社会的图书馆，为资产阶级服务。社会主义社会的图书馆，为无产阶级服务。

例如，清朝官办的文津閣、文淵閣、文淵閣、文瀾閣……以及一些官僚地主办的藏书楼，象海源閣、鉄琴銅劍樓等，都是为封建統治阶级服务的。統治阶级一直是以图书作为“教化”的工具，作为維护阶级統治的工具。辛亥革命前后，藏书楼虽然大都改成了公立图书馆，实际上，仍旧是統治阶级的“教化”工具，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墨索里尼自傳”等宣传法西斯蒂思想进行反共教育的图书，以及一些宣扬迷信、荒誕、淫秽的书刊充滿了图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887 頁，人民出版社 1953 年北京第 1 版。

館，而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一些进步的书刊，却被列为禁书查封了。仅从 1938 年 10 月起到 1941 年 6 月止短短的二年半的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的书刊就有 961 种。有些图书馆虽然也收藏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它的目的是为資本家培养恭順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①同时，他們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劳动人民拒之于門外。例如，有的图书馆規定借书要交押金，找鋪保，穿短衫的人不能进館等等，使工农群众根本进不了图书馆。正象毛主席所說的：“他們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傳，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②

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我国，也把图书馆作为文化侵略的工具之一。他們企图利用图书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服服貼貼地作他們的順民和奴隶。例如，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东北的时期，連带有“中华”二字的地理历史书籍也被查封，而代之以宣扬“日、滿、华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內容的奴化书籍。又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帝国主义在北京等几个大城市都办了美国新聞处图书馆，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宣扬美帝独霸全球的野心。他們的书架上充滿了各种色情、恐怖、种族歧视的书刊。此外，帝国主义者还利用图书馆搜集我国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报。如上海徐家汇天主

① “列宁全集”28卷 69 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12 月第1版。

② “毛泽东同志論教育工作”12 頁，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

堂图书馆就不仅搜集了我們的各种情报資料，还搜集了我國的革命文件、宣傳品、標語、傳單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办的滿鐵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量有关东北的政治、經濟、軍事、資源考察等各方面的情報資料。

由此可見，封建統治者、地主、資產階級、帝国主义从来就是把图书馆作为統治人民的工具。不管它們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都是为了达到奴化、毒化被压迫人民，消灭人民的革命思想的目的。仅就这一点說，图书馆事业的阶级性，不是异常鮮明嗎？

但是，在这个問題上，有人却标榜“清高”，否认图书馆事业有阶级性，把图书馆事業說成是什么“超阶级”的东西。这种說法，实质上是为剥削阶级施放烟幕彈，其目的在于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意志，以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統治。

这种观点，解放前固然十分普遍，解放后仍然存在，例如，杜定友先生在“新图书馆手册”^①上說：“图书馆为人民服务，对于讀者，不分阶级，一視同仁”。刘国鈞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②这篇文章里說图书馆事业有五項要素：“(1) 图书，(2) 讀者，(3) 領導和干部，(4) 建筑与設備，(5) 工作方法。很显然，五者之中缺少任何一項，就不能有

① 1951年3月中华书局初版。

② 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訊”1957年第1期。

图书馆的存在”。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概论”^① 上说：“图书馆的设立，有三大要素。（一）要能够积极的保存。（二）要有科学的方法，以处理之。（三）要能够活用图书馆，以增进人民的知识和修养”。

很明显，杜定友、刘国钧两先生所津津乐道什么“不分阶级”、“五要素”、“三要素”等等（恕我们不一一征引了），无非是用来模糊人们的眼睛，抹煞图书馆事业的阶级性。何以见得？因为他们总是避而不谈图书馆事业的阶级性，亦即避而不谈图书馆应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际上却是主张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知道，图书馆事业是国家整个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应当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筑服务。它不能脱离政治和经济而单独存在。它的活动，直接间接会影响到政治和经济，因而必须贯彻党和国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列宁认为：“图书馆和农村图书室，将在长时期里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和几乎是唯一的机关^②”；又说，必须在每个学校中都能“成立有政治类书籍的图书馆阅览室”。可見图书馆事业是有着鲜明的、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战斗性的。而杜定友、刘国钧两先生却说什么“不分阶级”、“五要素”、“三要

① 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列宁论图书馆工作”10页，时代出版社1957年版。

素”等等，显然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上，他們总是“方法中心論”或“技术决定論”，強調技术第一。例如，刘国鈞先生认为：“现代图书馆之所以成为科学的事业，就因为它具有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是图书馆学中心。”^①这一論点乃是刘先生一貫的主張，他在“图书馆学要旨”^②一书中曾說道：“图书是原料，人員是整理和保存这原料的；設備包括房屋在內，乃是儲藏原料、人員、工作和使用图书的場所；而方法乃是图书所以能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是将图书、人員和設備打成一片的聯絡針”。这种說法抹煞了图书馆学最主要的中心环节：方針任务和指导原則。它与“超阶级”的思想是异曲同工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真实面目，企图把人們引向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而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方法中心論”或“技术决定論”，同时又是资产阶级見物不見人的思想反映。他們只看到书，所以強調研究图书的收藏、管理的方法，而看不見图书馆的千千万万个讀者。我們反对“方法中心論”或“技术决定論”，并不是不要方法与技术或忽視方法与技术，我們认为方法和技术，都是从属于政治的，也就是服务于政治的。图书馆工作的一切方法和技术都是为讀者服务的，在研究图书馆工作的方法和技术时，首先要

① 见“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着重点是本书編者加的。

② 1934 年中华书局出版，1949 年再版。着重点是本书編者加的。

从便利讀者出发。改进方法、革新技術，只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杜定友先生、刘国鈞先生一再強調說图书馆学是分別研究什么“五要素”、“三要素”……等等的科学，这又充分說明了他們用的是形而上学的觀點和方法。他們只見事物的表面現象，而看不見事物的本质。他們认为事物是靜止的、孤立的，而不懂得事物是发展的，各个事物都有它一定的內在的联系。要知道图书馆学是屬於社会科学范畴的一門科学。它应当研究整个图书馆事业和它的全部活动的規律。它所要研究的对象，應該是整个图书馆事业如何貫彻基本方針、基本任务以及图书馆事业的建設原則，各項业务工作等；研究的方法，應該是实事求是，理論与實踐統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集中全国图书馆工作的經驗，上升为理論，反过来又指导實踐，把图书馆学作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前进的武器。我們对于“图书馆学”的許多問題，跟資产阶级的图书馆学者在看法上和說法上都不一样，这就是因為我們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用的是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觀點和方法的緣故。

(二)

我們馬克思主义者，一貫堅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對待一切事物，所以我們對圖書館事業的階級性不僅毫不隱諱，相反地認為只有充分地認識了圖書館事業的階級性，才能很好地研究它的发展規律。當圖書館事業掌握在地主、資產階級手中的時候，它就成為奴化、毒化人民思想的工具，成為統治階級培养恭順奴才的工具。但是，當這一工具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時候，它就成為人民教育自己，提高文化科學知識，提高階級覺悟的有力武器，成為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同時，圖書館事業也只有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時候，它才能蓬勃地發展，才能隨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逐漸成長壯大。

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歷史時期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之下的圖書館，都是直接和間接地為民主革命服務的。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同志和毛澤東同志，曾經利用北京大學圖書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團結了不少青年革命知識分子，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研究和討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1920年，毛澤東同志在長沙創辦青年圖書館，向廣大青年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團結湖南進步青年的活動中心。1921年，毛澤東同志又在他親手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附

設了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搜集了當時國內可能收集到的進步書刊，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黨的領導下，有的圖書館直接提出了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口號，如1921年成立的上海通信圖書館，就提出：“旨意在使得無產者有得書看。”這個圖書館運用通信借書的方式，大量流通着“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馬克思與唯物論”、“階級鬥爭”等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進步文化實行反革命的“圍剿”，用盡一切殘酷的辦法，限制、破壞和查封了一些進步的圖書館，上海通信圖書館就在1929年被查封了。1933年又出現了螞蟻圖書館，它繼承了上海通信圖書館的革命傳統，為進步文化事業、為革命宣傳，盡了最大的努力。這兩個圖書館在當時的作用是相當大的。那時候由於革命的需要，有些同志還組織了地下圖書館，有些同志和黨的外圍組織，在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里，利用圖書館，向學生傳播革命思想。同時，我們的黨在革命根據地和游击區廣泛開展了革命文化運動，雖然條件非常困難，也創辦了很多為工農兵服務和為革命戰爭服務的圖書室，建立了蘇維埃中央圖書館，開創了無產階級政權下的紅色圖書館事業。這些圖書館為革命服務，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方向是非常明確的。那種不屈不撓地同敵人鬥爭的精神，那種克服一切困難辦館的精神，利用各種形式，生動活潑地宣傳革命思想的工作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很好地學習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和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

地，党的图书馆事业象旭日东升，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的人民武装部队，以及党政机关和学校等，新创办和发展了很多图书室和图书馆。其中陕甘宁边区的几个大学，如马克思列宁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以及中共中央等机关的图书馆规模较大，办得较好。不仅这样，公共图书馆也建立起来了，如延安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都具备了革命图书馆的特色。如中山图书馆收藏了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除搞好阅览、流通工作外，还积极开展了材料工作、读者顾问工作和编刊工作等。为了配合当时关于宪政问题研究的需要，他们搜集了各种资料，单辟一室专供读者阅览，并编印了“宪政论文选集”、“宪政论文索引”等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以后并出版了时事资料、世界大事表、每月全国报纸杂志论著索引等三种定期刊物。在敌后的部队、机关、学校，虽然比延安的条件还困难得多，但也利用各种形式办了小型的图书室，大量流通了毛主席的著作、各种政治理论读物以及优秀的文艺作品等。在这一时期，党的图书馆事业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图书馆（室），物质条件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他们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教育与鼓舞广大人民，为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战，为解放全中国而

战。在国民党統治区的革命图书馆工作者，爭取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了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运用图书报刊，揭露蒋介石的黑暗統治，宣傳革命，启发与激励人民的斗争意志。解放前夕，他們又千方百計地保护人民图书财产，迎接解放。在这一时期，解放区和国民党統治区的革命图书馆工作者，都发揚了革命精神，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貢献了他們的力量。

解放以后，全国图书馆事业在党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巨大工作，更加发展壮大起来了。

首先是逐步明确图书馆事业的方針任务。1950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1955年7月2日中央文化部“关于加强与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都明确地指出了图书馆事业必須大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义、毛澤东著作，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普及文化，大搞图书流通，注意为科学研究服务。1956年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1957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又进一步明确了图书馆事业除了为普及群众文化很好地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外，还要配合“向科学进军”加强为科学研究服务。这在省、市、自治区的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更是一个主要的任务。为此，并确定了两个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和九个地区中心图书馆，以这些图书馆为中心，組織各地区的图书协调和业务协作。

在明确图书馆事业方針任务的同时，一方面改造旧中